

南台人文社會學報 2016 年 5 月

第十五期 頁 21-52

清儒魏源〈默觚〉的人格思想及其對大學生之啟示

黃文樹*

摘要

清代道咸年間大儒魏源在其思想代表作之一的〈默觚〉中，型塑了理想人格，對理論上以「心」為德行修養之核心、價值取向上以「德」馭勢、利、名，內涵上以「仁」與「廉恥」相聯繫和方法上重「自反」與「尚儉」工夫等方面做了學理論述。同時，針對貪得無厭、罔顧廉恥、麻木不仁的鄙夫與鄉愿，則予以深刻揭露和批判。在魏氏看來，社稷之興亡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才，而人才的標準以「德才兼備」為是。魏氏的人格思想，對於今日大學生可有下列三項的啟示：一是，強調「治心」的重要義涵，啟發學生料理己心；二是，重揭身心修養的核心價值，牖迪學生涵養品格；三是，倡導律己原則與自我教育，引領學生型塑形象。這些觀點，對於牖迪當前大學生涵養品格、培育軟實力，應有助益。

關鍵詞：魏源、人格思想、品格培育

*黃文樹，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教授

電子信箱：wen@stu.edu.tw

收稿日期：2015 年 08 月 07 日；修改日期：2016 年 05 月 05 日；接受日期：2016 年 05 月 27 日

STUST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6

No. 15 pp.21-52

Qing Dynasty Confucian Scholar Wei Yuan's Idea of Character as Proposed in *Mo-Gu*,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llege Students

*Wen-Shu Huang**

Abstract

The great Confucian scholar Wei-Yuan released one of his masterpieces 〈Mo-Gu〉 during the year of Dao-Xian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masterpiece presents the formation of his ideas about the ideal character. Theoretically, this research was based on the “heart” as the core of moral conduct and self-cultivation. It was value-oriented by managing strength, advantage, and came through “virtue.” “Humanity” and “sense of honor”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one another in meaning. His research method also involved theoretical discourse in relation to “self-examination” and “frug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search engaged in exposure and critique of greedy, shameless, apathetic and shallow people, as well as hypocrites. In Mr. Wei’s opin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ountry is determined by the quality of its personnel rather than the amount in the public treasury, with the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personnel being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possess “both integrity and capability.” Wei’s thoughts about character may have inspired people in at least three ways when it comes to college students today. First of all, this research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nourishing the heart” to inspire students to control their feelings. Next, it revealed the core values of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and the body to guide students and teach them how to cultivate character. Thirdly, this research advocated principles of

*Wen-Shu Huang, Professor, College of Liberal Education, Shu-Te University

E-mail: wen@st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Aug. 07, 2015; Modified: May 05, 2016; Accepted: May 27, 2016

self-discipline and self-education to guide students and teach them how to form an image. It is hoped that these points of view may be of value in highlight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haracte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nurturing soft power, and thus be of benefit to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Wei Yuan, Idea of Character, Character Training*

壹、前言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生，咸豐六年（1856）卒。嘉慶十九年（1814）以拔貢入都。道光二年（1822）舉順天鄉試；道光九年（1829）入資為內閣中書。道光二十四年（1844）成進士，發江蘇以知州用，權東臺、興化縣事。著有《魏源集》（收入《古微堂集》、《古微堂詩集》等）、《海國圖志》、《皇朝經世文編》、《書古微》、《詩古微》、《聖武記》、《老子本義》等傳世。《清史列傳》卷六十九〈儒林傳·魏源〉，說他「經術湛深，讀書精博。……又喜談經濟。……成《海國圖志》一百卷，番禺陳澧（1810-1882）常歎以為奇書。」（中華書局編輯部，1983，頁 52-53）在道咸外侮日亟之際，他以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政策而聞名。

清人姚永樸（?-1939）在所撰〈魏默深先生傳〉，對於魏源的成學歷程及其治學取徑有較多著墨。該文指出：魏源「年十有五補諸生，乃究心王陽明氏學，尤好讀史。」（閔爾昌，1985，卷 24，頁 8）復從胡承琪（1776-1832）問漢儒學，從姚學棗（1766-1826）問宋儒學，從劉逢祿（1776-1829）問公羊學。詩古文詞則與董桂敷（嘉慶十年進士）、龔自珍（1792-1841）相切磨（同上）。姚文說明了魏源自少年至青壯年時期究心陽明學，以及好學、博學的精神。

若將姚永樸的「魏源傳」與魏源之子魏耆為其尊嚴所寫的〈邵陽魏府君事略〉相綜合，則魏源學行之輪廓就更為明朗。〈邵陽魏府君事略〉云：「十五歲補縣學弟子員，始究心陽明之學。」（清·魏源，2009，頁 947）中舉後，江蘇布政使賀長齡（1785-1848）延輯《皇朝經世文編》，遂留意經濟之學。道光八年（1828），遊杭州訪詢釋典，「求出世之要，潛心禪理，博覽經藏。」（同上，頁 948）翌年，應禮部試不第，遵酌增例，為內閣中書，得留意國朝典故。

值得注意的是，該〈事略〉提到魏源在教育上的風格與實績，文云：「聽政之暇，以典籍自娛，不事苛察。與客接，無多言；有問學者，則反覆譬導，娓娓不倦。」（同上，頁 959）權東臺時，泮宮前有瓦窯數十座，歷百餘年已，愀然曰：「國家求人材於士林，而鬻庠實士之根本，烈焰衝霄，終年燔炙，復何望耶？」（同上）遂銳意遷之。又知高郵時，曾曰：「作養人材，守土者之責也。」（同上，頁 960）同權東臺一樣，竭力改造學校教育環境，使該州從那以後甲科不絕。「至於改建書院，儲書籍，……設義學，……一切善政，不可枚舉。」（同上）這些記述，留下了魏源奉獻教育大業的印跡。

自期「寧為慥慥篤實之君子」（同上，頁 31）的魏源，既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務實的思想家。錢穆（1895-1990）《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中有〈讀古微堂集〉一文，指出：魏源在道光十一年（1831），「代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由此留心時務，志在用世」（錢穆，1986，頁 295）；其學「兼采漢宋，並重古今」（同上，頁 298）；其論學，「不在辨兩漢經學之今古文，而尤要在辨乾嘉經學之無用。故主融經史，……求為一有用之通儒。」（同上，頁 299）錢氏肯定魏源之學，「主尊德性必兼道問學」，認為這是乾嘉諸儒難有之「大義」（同上，頁 300）。

截至目前，學界對於魏源的研究不算少¹，但集中於魏氏年譜、經世思想等層面，針對其倫理思想、人格理念的解析則有待深化。〈默觚〉是《魏源集》中相當具有哲理意味，質量並重的佳構。該文又分「學篇」與「治篇」，倡述其心性觀、修養論、治學觀、教育論，以及國家治理之道等。他於文中，型塑了理想人格，頗值梳理與參考應用。本文主要

¹ 學界對於魏源的研究，主要有：1967年王家儉《魏源年譜》（1981年再版）、1984年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1985年黃麗鏞《魏源年譜》、1999年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2006年彭大成與韓秀珍《魏源與西學東漸——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艱難歷程》、2005年李國祁〈包世臣與魏源經世思想比較分析〉、2007年林鳳壯〈清季自強運動興起的一項動力——論魏源的經世思想〉、2011年張麗珠〈魏源突破儒學傳統經典視野的維新思想〉等。

採取文本分析法，針對該文，並融入魏氏有關論說，梳理其人格思想，同時據以引伸它對於今日大學生之啟示。

貳、〈默觚〉的人格思想

本文所謂「人格」(personality)，不取心理學定義——「個體在其生活歷程中對人、對事、對己以至對整體環境適應時，所顯示的獨特個性。」(張春興，1991，頁 480)而採教育學義涵，即「以先天的個性作根基，超出個性之上，用一種努力，創造出來一個理想的精神的成就。」(田培林，1976，頁 84)換言之，此處之人格即修養個性，使「人而有格」，臻於一種理想的特質與品格。

中國傳統哲人向重植基於心性基礎上的人格教化，往往將思維導向規約性的品德涵泳。誠如錢穆在《中國學術通義》所言，「中國文化之獨特性，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中國學術亦然。……學問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錢穆，1984，頁 6)魏源的〈默觚〉也不例外，其對於理論上以「心」為德性修養之核心、價值取向上以「德」馭勢、利、名，內涵上以「仁」與「廉恥」相聯繫和方法上重「自反」與「尚儉」方面做了學理論述。茲分述如下：

一、理論上以「心」為德性修養之核心

大體說來，中國傳統的修養觀，孟子的「存養」——「存其心，養其性」的提法，一直影響著後世。據羅國杰的觀點，由漢至隋唐，社會上實際較多地是依靠外在的「禮」來調節道德觀念與行為；宋代以後，情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理學要求人們通過內心對「理」的體認，以提高道德自覺(羅國杰，1995，頁 231)。宋明思想家提出了「養心」、「存心」、「正心」、「誠意」、「持敬」、「居敬」、「主靜」、「變化氣質」、「致良知」等修養方法。這些方法主要是用來培養和保持自

己本心中的善性，使之發揚光大，或者把自己已經被外物所蔽的良心重新尋找回來。

王陽明（1472-1529）繼承、發展孟子的「四端說」、「存心養性」觀及「萬物皆備於我」論，揭櫫、闡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與「致良知」說，建構了心學系統。陽明以人心為天地萬物之主，謂：「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明·王守仁，1992，頁214）強調「吾心」是萬事萬物之源，認為一切皆依附於心。他又說：「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同上，頁156）心便是一切，無在心外者；眾理眾事皆備於心。陽明堅信人的本心「靈明」，天地萬物的存在，純粹仰賴人心的靈明，才得以活現。他舉例說：「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同上，頁124）離開人心的靈明，天地萬物便一無所有。換言之，人心具有主宰作用與主動機能性。

陽明的思想，深深影響了距他身後約300年的魏源。魏源非常景仰陽明，尤其對陽明武功特為欽佩。他在〈廬山王文成公紀功碑歌〉一文，判定近代儒士最善用兵的豪傑只有陽明一人，其文云：「儒生倉卒神用兵，近代豪傑惟文成。……豈知未平逆藩先平贛，上游地險兼兵勁。……勛名總由定力致，圍棋羽扇觀平生。」（清·魏源，2009，頁734-735）魏氏此文所言，主要指當年陽明平定寧王朱宸濠（?-1521）之亂。依《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譜一〉載，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陽明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明·王守仁，1992，頁1238）。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初，陽明奉敕戡處福建叛軍，當月十五日，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同上，頁1258）。七月中旬，擒宸濠；九月中旬，將宸濠交付太監張永（1465-1529）於錢塘（同上，頁1267-1268）。隔年正月，陽明返江西，過廬山之開先寺，留石刻

「讀書臺」後，題詞內容即記平定宸濠始末大要（同上，頁 1270）。依王家儉之研究，道光二十七年（1847），魏源有嶺南、澳門、香港之行，北歸途中遊廬山（王家儉，1981，頁 114-117）。據此可推，魏源〈廬山王文成公紀功碑歌〉應作於此時，這距陽明勒石記平宸濠軍事已有 326 年。

魏源另有〈王文成贊〉，表彰陽明。贊云：「道學傳孟、陸之統，事功如伊尹之任；與程、朱皆百世之師。」（清·魏源，2009，頁 319）認為陽明繼承孟子、陸象山之統緒；而事功顯赫，有如佐商大臣伊尹。魏氏並認為陽明與程子、朱子都是偉大的「百世之師」，評價極高。

魏源主張「心本靈光覺明」，在其思想著作中，可見一種「心力決定論」，反映出他之吸取與應用陽明心學。如其〈默觚上·學篇五〉說「心」，謂：「靈光如日，心也。」（同上，頁 13）「熙者，人心本覺之光明。」認為人人具有「靈覺本明」之心（同上，頁 14）。他又云：「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誠使物交物引之際，回光反顧，而天命有不赫然方寸者乎？」（同上，頁 12）認為聖人的一言一語，「則千里之外應之」；「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萬物均受心所驅使，心神一動則「氣滿大宅」，推動萬物（同上）。他另於〈默觚·學篇十一〉表示：心小翕則小力，大翕則大力；人表現出來的力量之小大，端視其心翕聚之小大。他說：「力之小大，由於心之翕散」，「自內出者其力弘」（同上，頁 27）。凡此在在彰明心力之決定作用與強勁力道。

緣於上面的本心觀與心力論，魏源強調「心」是德性修養之核心。他在〈默觚·學篇七〉云：「心為天君，神明出焉。……聖人以心為君，以身為城，以五官為臣，故外欲不入謂之關，內欲不出謂之扃，終身泰然。」（同上，頁 18）他又在〈默觚·學篇四〉說：

君子之學，不主逆而主復。復目於心，不期聞而自不洽矣；復口於心，不期默而自不欺矣；復肝腎於心，不期懲窒而自節矣；復形於心，不期重而

自重矣；復外馳之心於內，不期誠而自不偽矣（同上，頁 11）。

此處之「復外馳之心於內」，意指將外馳之心，尋回並復於本心，即日常言行舉止若都能復歸靈覺本明之心，則就可以不冶（不狎邪）、不自欺（不昧良心）、節制、自重、至誠等，如此，也就做到「口、耳、百體無不順正」（同上）的理想。

魏源生活的年代，中國面對的問題相當嚴峻，諸如河工、漕運、鴉片、科舉、軍費等皆出現極困窘的惡況。對此，他在〈明代食兵二政錄敘〉憂心地說：

無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此前代所無也；夷煙蔓宇內，貨幣漏海外，漕鹺以此日散，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無也；士之窮而在下者，自科舉則以聲音詁訓相高，達而在上者，翰林則以書藝工敏、部曹則以胥史案例為才，舉天下人才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此前代所無也；其他宗祿之繁，養兵之費，亦與前代出入。……天下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同上，頁 163）。

國計民生諸疾，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但事實上，朝野多數人，依然我行我素，「潛化於麻痺不仁而莫之覺」（同上，頁 66）。魏氏認為這問題主要肇因於「人心之積患」，乃發出了叫醒人心使之覺的獅子吼（同上，頁 207）；他籲請「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同上，頁 208）力圖喚起國人的憂患意識，共赴國難。依其觀察，若能重振人心，則將隨之「風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國計日益裕」（同上，頁 414）。

魏源是坐言起行的人。在學術上，他為挽救時代危機，落實了「通

經致用」的理想（賀廣如，1999，頁 231）；表現出「援經議政」路徑（張麗珠，2011，頁 23）。其犖犖大者，如協助編纂成《皇朝經世文編》巨構，寄寓追求實功的經世精神；又如他編就《海國圖志》一百卷，倡導「師夷長技以制夷」；再如他撰寫〈籌河篇〉、〈籌漕篇〉、〈籌鹺篇〉等針對現實問題，提出系統考察與解決策略。這些心血結晶無非是基於滌除腐朽官僚卑劣心理，重建民族信心的力作。

二、價值取向上以「德」馭勢、利、名

所謂價值，泛指有助於促進或提升人生的意義與功用之事物或抽象概念。人在生命歷程中，主觀的心理思維，常和客觀的事物及精神性理念發生交互作用的活動，往往利用客觀的事物及精神性理念以促進和達成生命與心靈的發展，而完成自我理想的實現。這樣一來，便產生了價值選擇、價值取向的課題。

大體上，中國傳統儒家以兼備智仁勇「三達德」之「聖人」為最高人生價值鵠的；同時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可使人永遠留芳萬世而不凋朽。儒家的教化目的，以「成聖」為終極理想，而以「成己」為基本目標，亦即要修身成己，做一個「君子」。《禮記·曲禮上》云：「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清·孫希旦，1984，頁 65）以完成修身修業來定義君子。《論語·學而》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宋·朱熹，1985，頁 48）認為君子專力於做人最根本的孝弟之道。《論語·里仁》云：「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同上，頁 71）強調君子一心考慮著德業的精進。

魏源在價值取向上，顯然是依循傳統儒家的價值觀，以「德」作為價值抉擇的最重要圭臬。他在〈默觚·學篇二〉云：

用智如水，水濫則溢；用勇如火，火烈則焚；故智勇有時而困，且有時而自害。求其多而不溢，積而不焚者，其惟君子之德乎！德善積而不苑，其

德彌積，其服彌廣，其行彌遠而不困（清·魏源，2009，頁6）。

認為智與勇之助人學習、開展志業、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等，確有實效，但「有時而困」——即面臨侷限或瓶頸，甚至若用力過度還可能導致反作用。相形之下，行德、積德則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多多益善。反之，若無德，則任何好事也做不成，他說：「身無道德，不可以信世；主無道德，雖襲法古制，不足以動民。」（同上，頁7）這可見其重德之一斑。

在魏源的觀念中，「德」始終是第一優先的。他在〈默觚·治篇三〉說：

聖人以其勢、利、名公天下，身憂天下之憂而無天下之樂，故褰裳去之，而樽俎揖讓興焉；後世以其勢、利、名私一身，窮天下之樂而不知憂天下之憂，故慢藏守之，而奸雄覬奪興焉。……惟使勢、利、名純出道德者，可以治天下矣（同上，頁44）。

魏氏與范仲淹（989-1052）相近，主張身憂天下之憂而無天下之樂，反對窮天下之樂而不知憂天下之憂。他認為，若一位君子能以「道德」駕馭權勢、利祿、名望，那麼他就足以治理天下了。他舉周文王以德治天下為例析道：「聖王之治，以事功銷禍亂，以道德銷事功；逆而泯之，不順而放之，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是謂反本復始之治。」（同上，頁72）此處之「本」（根本）、「始」（源頭），即指德而言。

在魏源看來，無德之得，或是非份之得，都是不該得的。他在〈默觚·治篇十六〉云：

無故之利，害之所伏也；君子惡無故之利，況為不善以求之乎？不幸福，

斯無禍；不患得，斯無失；不求榮，斯無辱；不干譽，斯無毀。……非其利者勿有也，非其功者勿居也，非其名者勿受也。倖人之有者害，居人之功者敗，無實而享顯名者殆（同上，頁 76）。

從這段話可知，魏氏非常注重獲得名譽、利祿、榮耀、財富等之過程的正當性與道德基礎，以一種近乎出自純粹善的動機與嚴格意義下契合道德可欲性的規準，來衡量、要求一個人的行為。他所說「非其利者勿有，非其功者勿居，非其名者勿受」，此等話說得如此肯定而又強勁有力，這在中外倫理學史上並不多見。

魏源「惟使勢、利、名純出乎道德者，可以治天下矣」的觀點，可說是對傳統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的現實化表述。他在〈默觚·學篇九〉云：「內聖外王，以道兼藝，立師儒之大宗。天下後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仁者見仁焉，智者見智焉，用焉而各效其材之所宜。」（同上，頁 22-23）期許人們立身處世宜「以內聖外王為準鵠」，「各因所長」去用世、應世，則「何本末偏枯之有！」（同上，頁 50）他明確的以德為先、為本，指出：「立德、立功、立言、立節，謂之四不朽。……無德之功、節、言，於身心為無原之雨，君子皆弗取焉。」（同上，頁 22）這些話與孔子所提仁道實有遞嬗之跡。孔子倡導仁者修身成德之後，應「以己及物」、「推己及人」——由修身、盡己進而推及他人及萬物——等論說，散見於《論語》的文阡字陌間。例如〈雍也〉篇所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宋·朱熹，1985，頁 91-92）；又如〈憲問〉篇所言：「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同上，頁 159）等，都透顯了「內聖外王」的精神。魏氏的上面觀點與傳統「仁者」精神前後同揆。

這裏特別要關注的是，魏源尊德，但他認為光有「德」而無「才」，並非真正的人才。時值國家多事之秋，他在〈默觚·治篇八〉認為，社

稷之興亡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才（清·魏源，2009，頁 55）。他於〈默觚·治篇十〉針對人才的標準道：「專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專以德取人，必致取鄉愿。」（同上，頁 62）德才兼備為是。利口與鄉愿，都有其善巧之「本事」，其缺失不易被外界察覺，魏氏作了下面剖析：

利口有二，鄉愿亦有二：有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之利口，君子在上，可驅策用之；若夫辯足以飾非炫聽，智足以舞文樹黨，警敏強記，口若河懸；……不可一日近，而究誰能不近之？有不可臨大節而可佐承平之鄉愿，……；若夫深中厚貌，以小忠小信結主知，以曲謹小廉拒物議，欺世盜譽，靜言庸違，明主亦傾任而不疑，……不可一日容，而究誰能不容之？烏乎！世有君子，能遠無才之小人，未必能遠有才之小人也；能識毗陽之小人，未必能識毗陰之小人也（同上，頁 62-63）。

利口，工於巧言令色，雄辯善舞；鄉愿，長於人際關係，八面玲瓏，因此他們的飾非炫聽、樹黨營私、欺世盜譽等勾當，往往能得逞。這是魏源此段文字最感遺憾之處。

魏源唾棄那些以推諉為明哲、以持祿養驕為鎮靜、以繁文縟節為足齟太平、以奉行虛文故事為得體的鄙夫、鄉愿，斥為「害治之徒」、「害德之徒」。他在〈默觚·治篇十一〉云：

鄙夫胸中，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為何事，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才為何物；所陳諸上者，無非膚瑣不急之談，粉飾潤色之事；以宴安酖毒為培元氣，以養癰貽患為守舊章，以緘默固寵為保明哲，人主被其薰陶漸摩，亦潛化於痿痺不仁而莫之覺。豈知久之又久，無職不曠，無事不蠱，其害且在強籓、女禍、外戚、宦寺、權奸之上；其人則方託老成文學，光輔生平，攻之無可攻，刺之無可刺，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已不與其責焉。……故鄙夫之

害治也，猶鄉愿之害德也（同上，頁 66-67）。

這與孔子之惡鄙夫、鄉愿為「德之賊」，幾乎雷同。在魏氏看來，國家欲富強，必要使有德有才，又有擔當之賢士出頭，讓他們的讜議、偉略用於世（同上，頁 51、55）。

三、內涵上以「仁」與「廉恥」相聯繫

中國傳統教育目的，約可歸納為：1.明彝人倫，2.修己善群，3.涵養心性，4.格物致知等四項（伍振鷺等，2005，頁 87）。前三項概把教育方向導引到人格養成：明彝人倫，主要的內容是五倫之教；修己善群，主要的內容是以兼重「修己」（自我成德）與「善群」（服務社會）之「仁」為中心的生命理想；涵養心性，主要的內容是從孟子到宋明清一脈相傳的存心、養性、正心、誠意、養氣、集義、居敬、持敬、節欲、致良知、慎獨、知恥等修養工夫。即使是第四項格物致知，程朱一派從知識追求立論，但陸王一派則仍就道德實踐切入，還是以人格陶冶為歸趣。

在人格養成的內涵上，魏源從上舉傳統人格教育內容中選擇了「仁」與「廉恥」二種品德作為重點，並予以聯繫起來。首先，他在〈默觚·學篇十三〉說：「身之內有心，心之內有仁。……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賦以此種子之仁。」（清·魏源，2009，頁 30）魏氏「心之內有仁」、「天賦此種子之仁」的提法，應脫胎自《孟子·告子上》「仁，人心也。」（宋·朱熹，1985，頁 333）以及〈公孫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上，頁 237）的論點。他同程子一樣，比喻「心如穀種」，認為仁是心內之德種。他主張每個人本心中都有「仁」的種子，這是天賦的，而只要地力、雨露、人事等適當的滋潤之，則這「仁」的種子，就可以「油然渤然不容已於方寸。……可蕃衍化育，成千百萬億之仁於無窮，橫六合，亙古今。」（清·魏源，2009，頁 30）相反的，

設使一個人成長過程中，受到「功利之稗」、「記誦之稗」、「詞章之稗」、「嗜好之稗」等之侵奪、滲泄，則「仁之存者寡矣」（同上，頁 30-31）。依其觀點，人人皆有「仁」種，若得順適之栽培，便自然萌發茁長，蕃衍化育於無窮；反之，若受到外在利祿功名所誘所奪，便會耗損以致減少。

在魏源看來，仁有「好仁」、「惡不仁」之分。他在〈默觚·學篇一〉云：「好仁者以順入，見善如不及焉；惡不仁者以逆入，見不善如探湯焉。」（同上，頁 1）他舉孔子門下為例：顏回屬「好仁」者，「由高明入中行」；曾參則屬「惡不仁」者，「由篤實入高明」（同上）。觀諸顏回志行，孔子在〈子罕〉篇說他「語之而不惰」（宋·朱熹，1985，頁 114）；又在〈為政〉篇說他「不違如愚」（同上，頁 56）。顏回對於孔子所授仁道的教誨，無所不悅，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此群弟子所不及也。而其聞於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那是「大智若愚」——由孔子之言：「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同上），可為證。再徵之《中庸》對顏回之評價：「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同上，頁 30）故以顏回作為「由高明入中行」的「好仁者」之代表，應是確當的。另盱衡曾參志行，《論語·泰伯》載，他自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同上，頁 104）頗有「當仁不讓」的豪傑精神。仁者必有大勇，孟子在〈公孫丑上〉嘗記曾子之言：「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同上，頁 230）表現出一種篤實無畏、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這實為「惡不仁」者特有之氣節。今人蔡仁厚在《孔門弟子志行考述》一書中，指稱曾子是孔門最能盡「風義」的人（蔡仁厚，1982，頁 21）。意思是說，曾子既「德能感人」（風）又「言行方直」（義），在情義上最受人敬重。

依魏源的觀點，若能同時做到「好仁」與「惡不仁」，自然是最好不過了。他說：「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清·魏源，2009，頁 77）此處之「無欲」、「無畏」已聯繫到「廉恥」的要求，他在同篇云：「有所利而名仁者，非仁也；有所要而稱義者，非義也。居功之行，人不功其行；求報之惠，人不報其惠。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同上，頁 76）出於行為後利益回饋之嘉行，不能稱作仁行；因有所需要而做的義舉，也非真正的義。真正的仁義，是動機純粹的，是不求回報的，是與財利聲譽無涉的。

魏源認為，既然以「仁」為立身處世之準鵠，那麼，清廉與知耻之於人顯得尤為重要。他在〈默觚·治篇十四〉說：「使人不暇顧廉耻，則國必衰。」（同上，頁 72）。他在〈默觚·治篇十〉界定「廉」與「耻」如下：「輕財色為有廉，並輕權勢為有耻；辭受取予不苟為有廉，進退出處不苟為有耻。」（同上，頁 63）以不貪錢財、取予正當為廉，不重權勢、進退合宜為耻。此採品行潔正、有節操為廉，與傳統對廉的定義一致。至於傾向輕權勢、辭受不苟來界說耻的觀念，則與傳統的一般詮釋略有出入。傳統多以「羞愧的心」說「耻」，例如《論語·為政》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宋·朱熹，1985，頁 54）《論語·里仁》云：「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同上，頁 74）《論語·子路》云：「行己有耻。」（同上，頁 146）《孟子·公孫丑上》云：「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同上，頁 237）凡此概說人不可無羞耻心，亦即人應有道德自覺的知耻之心。古賢認為，如果一個人沒有羞耻心，那就什麼壞事也能幹得出來。可以說，魏源將「耻」聚焦於對權勢的不貪及對辭受的不隨便，使傳統義的羞耻心更加具體化、現實化。針對「耻」，他特別於〈默觚·學篇十一〉表示：「夢盜簞食而耻，夢盜萬金而耻，夢盜一國之寶而耻，事有小大，心無小大也。」（清·魏源，2009，頁 28）強調夢盜食、夢盜金、夢盜國寶均為盜欲，皆為有耻。連夢盜這樣夢寐中虛幻的景象都視為可耻，足見魏氏對於「耻」的嚴格

性定義。

由於魏源相當在意廉恥美德，故他在〈默觚·學篇十四〉認為那些為生活計、為子孫計的「好利之計」，以及為身後名計的「好名之計」，都應該加以根除（同上，頁 33-34）。依他的觀點，從政的官吏若個個清廉、有耻，則國家就有希望了。他在〈海國圖志敘〉云：

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毋馮河，毋畫餅，則人材之虛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同上，頁 208）。

他斥寡廉鮮耻、貪求富貴是「人心之寐患」，極力主張加以祛除。

在魏源看來，廉與耻兩者的作用是極大的。他在〈默觚·治篇十〉指出，不貪才色之「廉」與不貪權勢之「耻」兩者，「道誼大功必以之為本」（同上，頁 63）。就廉來說，他在〈默觚·治篇十三〉云：「清廉之裨人國者豈淺乎！『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能輕眾人所共貪者而後能為眾人之所服。」（同上，頁 70）惟廉然後能正直，然後能服人。就耻來說，他在〈聖武記敘〉云：「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同上，頁 167）可見其功能之大。

四、方法上重「自反」與「尚儉」工夫

在價值取向上，魏源以「德」馭勢、利、名，而其內涵，則尊尚「仁」與「廉耻」，已如前述。接著的問題是人如何進德？如何順利建構以德為主軸的價值系統？他提出的方法論是兼重「自反」與「尚儉」二項工夫。

魏源在〈默觚·學篇一〉開宗明義：「古人言學，惟自勘於旦晝。」（同上，頁 3）自勘，即針對自己的不足、過失進行檢討與改正。他本

於「心」是德性修養核心的理論基礎上，強調自我勘察、檢點要從「一念之中」起軔。他說：

古人言學，惟對勘於君子小人。……始知一念之中，有屢舜而屢跖者，有俄人而俄禽者；一日之中，有人多而禽少者，有跖多而舜少者；日在歧途兩界之中。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賢人，而聖人，而人道始盡。烏乎，嚴矣哉（同上，頁2）！

這裏，魏氏看到人的心行之複雜性與變化性。人的心思意念和行為，縱然如此微妙與無常，但他認為，若能時時於「一念之中」自我對勘君子小人之分際，則日去禽、跖而益就善人、賢人，終有一天或可成為堯舜，臻於聖人境界。

魏源注重「一念」間之心地工夫，也見諸〈默觚·學篇七〉。其文云：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² 迅雷風烈，有一人不肅然者乎，有一念敢妄萌者乎？即無良之人，有不恐懼修省者乎？誠莫誠於斯，敬莫敬於斯矣。常人之情，動忍於安樂時者十之一，動忍於憂懼時者十之九。人心能常如洊雷震罅³之時，何患不與天合一（同上，頁19）？

他在這裏強調惺惺修省之要，認為心行處務須惴惴小心，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他看來，人心若能常保如洊雷震罅之時那樣的戰戰兢兢，則可與天合一。

²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語見《周易·无妄》象辭。无妄卦，上卦為乾，下卦為震；乾為天，震為雷；故无妄卦象為「天下雷行」。天下雷行，則萬物生長，此為自然界必然現象，故從无妄。

³ 洊雷，指相繼而至的雷聲。《周易·震》象辭：「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震罅，意為因雷擊而裂開。

俗眾何以德業不進？魏源將之歸因於一般人往往自是、自大而不能「自反」使然。他在〈默觚·學篇三〉云：

世有自命君子，而物望不孚，德業不進者，無不由於自是而自大。自大則廉而劇物，才而陵物，議論高而拂物，方且是己非人。不知其心易盈者，正由其器小乎！小則偏愎狹隘，而一物不能容，奚其大（同上，頁 8-9）！

自大者，不是傷害人，就是欺壓人，拂物非人，當然無法成就大事業、大格局。相反的，能自我反省，懂得謙卑的人，才能轉小成大。他說：「誠能自反而心常畏，畏生謙，謙生虛，虛生受，而無一物不可容，奚其小！」（同上，頁 9）君子惟能自反不自大，斯能成其大。

魏源是走過世路的長者，閱人無數，得出下面〈默觚·學篇三〉之珍貴經驗談：

作偽之事千萬端，皆從不自反而生乎！做德之事千萬端，皆從自反而起乎！不自反，則終日見人之尤也；誠反己，則終日見己之尤也。終日自反，則放心不收而自收；終日不自反，則心難強收而愈放。愈內斂則愈無物我，而與天地同其大；愈外驚則愈歧畛域，而與外物同其小（同上，頁 9）。

這段話強調作偽之事，皆從不自反而生；作德之事，皆從自反而起；心愈是放逸，就愈容易被具體事物所侷限而走入歧途，像那些具體事物一樣渺小。觀點相當鮮明，把自反工夫之重要性與功能性講得真切明白。在他看來，那些德性敗壞的人即為缺乏「自反」意識的人。

古代社會上有德的君子固然並不常見，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上〉云：「古君子非常舉事，內審諸己，又必外審諸時。」（同上，頁 189）但是在魏氏生活的時代，也好不到那裏去。他在〈默觚·學篇二〉明言：

「末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同上，頁 7）針對「君子」難求的窘狀，他在〈默觚·學篇一〉籲請人們從自反、繩過、內禦下手，他說：「攻他人之異端，不如攻一身之異端。……始而以道德戰紛華，既而以中行繩過、不及，內禦日強，外侮日退，則人我一矣，則自身之異端盡矣。」

（同上，頁 1-2）此處自身之異端，指的是自己的不好習氣、缺失、弊病等，當「內禦」——即自反以改過向善的力量日益強大，則這些自己的異端，便會日益消失於無。而此處之「繩過」，即糾過、改過，魏源在〈默觚·學篇三〉呼應說：「聖人之過，聖人知之，……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小過雖聖人不免焉。眾人之過，過於既形；聖人之過，過於未形。」（同上，頁 9）認為人皆會犯過鑄錯，聖人亦不免，惟聖人能知過、改過，所以能成聖，但俗眾因不能知過、改過，故只能成為俗人、鄙夫。這實是他重視克己修慝的慎獨工夫。

為使人們能真正踐「仁」，保持「廉耻」，除「自反」外，魏源還鄭重呼籲「尚儉」，期許大家生活力求儉樸，反對奢侈浪費。他在〈默觚·治篇十三〉表示，儉可養廉，「惟節儉然後能正直」（同上，頁 70）。歷史上不乏因持儉而有所作為的人物，他舉例說：「儉如晏嬰，足服崔、慶之凶⁴；直如汲黯，足寢淮南之謀⁵。」（同上）這應可說明尚儉、正直的才臣之益國史實。

魏源認為，「儉」是使生活「有餘」、「無禍」的根本。他在〈默觚·治篇十四〉云：

萬事莫不有其本，守其本者常有餘，失其本者常不足。宮室之設，本庇風雨也；飲食之設，本慰飢渴也；衣裳之設，本禦寒暑也；器物之設，本利日用也。風雨已庇而求輪奐，輪奐不已而競雕藻，於是棟宇之本意亡；飢

⁴ 晏嬰（?-500 B.C.）服崔、慶之凶，事見《左傳》魯襄公二十五年，崔杼、慶封之亂（楊伯峻編著，1990，頁 1095-1110）。

⁵ 汲黯（?-112 B.C.）寢淮南王之謀反，事見《史記》卷 120〈汲黯列傳〉（漢·司馬遷，1982，頁 3105-3111）。

渴已慰而求甘旨，甘旨不已而錯山海，於是飽腹之本意亡；寒暑已衛而辨章服，章服不已而尚珍奇，於是裘葛之本意亡；利用已備而貴精麗，精麗不已而尚淫巧，於是制器之本意亡。……不足生覬覦，覬覦生僭越，僭越生攘奪。……禍莫大於不知足，不知足莫大於忘本（同上，頁 71）。

依其觀點，僭越、攘奪諸災禍乃由於不知足（貪多務得、爭麗競飾、求甘尚珍等），不知足乃由於忘了根本——即生活基本需求。在他看來，生活其實可以很簡單、樸素；「質、儉」的生活才能「守其本而有餘」，反之，「文、奢」的生活則「失其本而常不足」（同上）。他在〈默觚·學篇十〉甚至強調真樂的人生是過一種清淡、簡樸、少世味的尚道生活，他說：

君子以道為樂，則但見欲之苦焉；小人以欲為樂，則但見道之苦焉。……澹莫澹於五穀之甘乎，樂莫樂於道誼之湛乎！故世味不澹者，道味不濃；熟處不生者，生處不熟。道念苟同情念，何凡不聖矣；道味苟同世味，何愚不哲矣（同上，頁 25）！

言下之意是：當愈不追求以五穀飲食之甘味為中心之世味，則人的道味就愈濃郁，愈能接近聖哲。

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禁奢崇儉，但反對流於吝嗇。他在〈默觚·治篇十四〉云：「儉生愛，愛生吝，吝生貪，貪生刻。」（同上，頁 73）他認為，「天道惡積而喜散，王政喜均而惡偏，則知以儉守財，……非長民者訓俗博施之道也。」（同上）意思是說，過度的節儉，易淪入為窮急不恤之慳吝刻薄，這於私德、公德都不值肯定。在他看來，施而不奢，儉而不吝，才是圓善之道。

參、對大學生之啟示

大學之目標，不外乎培養學生「術」（專業知能）與「德」（品德修養）兼修的人才。誠如曾志朗在《正直》所言：

一所現代的大學，它的任務是要教育學生、教育民眾及教育教授自己本身，使大家有能力去分析過去的歷史，了解當前的自然與社會生態，並能以永續發展的理念去規劃未來！在大學的四年內，學生將由依賴家庭的小孩轉變成試著過獨立生活的社會公民，而這是大學除了傳授專業知識外，最核心的一項教育工作。其中關鍵的項目包括培養學生終生學習的認知能量，並在品格塑造上，使其能對生命有熱情，對社會公益能主動參與，並對國際社會的正義原則有所秉持（曾志朗，2013，頁 187-188）。

此段話彰顯了現代大學主要任務在充實學生專業知識、強化認知能量，以及陶冶品格諸方面之功能。

目前，臺灣有很多大學，他們的教育目標同上舉吻合，也都努力辦學。可是，很吊詭的，國內「有那麼多大學院校的畢業生，企業界卻一直抱怨找不到可用的人才。」（同上，頁 192）前面揭示了魏源主張人才應德才兼備，與今日大學教育學生之目標是一致的。上述分別從理論上、價值取向上、內涵上及方法上，探討魏源〈默觚〉的人格理念，這些觀點，對於今日大學生，強化其競爭力，可有下列三項啟示。

一、強調「治心」的重要義涵，啟發學生料理己心

晚近我國高等教育之缺失不少，漠視德育和學習態度消極二項，便都是箇中問題之一。1986年，吳大猷（1907-2000）在《教育問題》一書，提到我們的高等教育系統中，明顯偏重「知識傳授」，而忽略「德育」

和「學習的基本態度」；一般青年大學生，「欠禮貌，缺乏公德觀念，翹課」（吳大猷，1986，頁 16-17）。2005 年，陳玉峰撰文指陳當前大學生的情狀：

有的頂著數學奧林匹克冠軍的光環；有的埋首解剖，為來日懸壺濟世戮力；也有的……嗑藥搖頭、網交賤賣……。去年我教過的學生中，有來到大學三個月墮胎三次者；……我做過的普查，大約 6%到一成的大學生得了躁症或鬱症。大約十年前我慨嘆現代人只要不成為別人的負擔便算成功，如今則是每況愈下（陳玉峰，2005，頁 67）。

時下大學生固然有一些人是既優秀又認真，但不可否認另有些人就像上面陳氏所舉述的那樣。吳氏和陳氏評騭的缺憾，與大學生之疏於「治心」——意指料理己心及修養心地之工夫——無疑是相連繫的，因這些問題，往往肇因於自我心思之偏頗與自我內控力之不足。至於大學生畢業就業困難的問題，吳大猷認為因素極為複雜，不純是大學教育與社會需要脫節的簡單分析所能概括，但他強調：一個人的發展，重要的「資本」，是培養永續學習的能力和進取的意志毅力（吳大猷，1986，頁 106）。這裏，「進取的意志毅力」與「治心」工夫密切相關。

人生原本就有各種試煉，大學生涯中不免遭遇生活、交友及課業上的問題、挫折與困境，而畢業之後謀職就業或著手創業的過程，尤其充滿諸多挑戰與不確定性，這些都會衝擊人的心。設如心地工夫脆弱，往往無法面對挑戰和工作壓力，而伴隨出現諸如易怒、動輒挑別人的語病、疑心重、情緒欠穩定、易怪罪別人待己不公、易因小事起摩擦，甚至在肢體上或語言上攻擊他人等不成熟的、負面的情緒與行為，從而影響到自我概念、社會互動和人際關係。這很容易導致或以不能適應，或以無法勝任，或以無理失行，從工作崗位飲恨敗退下來。

按前述魏源的觀點，人的本心是清淨的、澄明的、靈覺的，當一個人未能料理自心、保持清醒的心境，而任由外界事物蒙蔽、牽累、鉗制，就會衍生諸多雜念、情染，導致「不仁」之「異端」。反之，若能善於料理己心，從容而穩定地扮演好各種角色，誠以待人，敬以處事，那麼很多生活上與工作上的問題，都比較能夠迎刃而解。依魏氏觀點，人的心力是極強的，心大翕則大力，心神一動可氣滿大宅，推動萬物。因此，己心若調治得好，把卑劣心理滌除，就能收到他所謂不冶、不自欺，口、耳、百體皆順正之境。可以說，心地工夫的強弱、良窳，攸關一個人做人處世的成敗。

「治心」工夫做得好，其體現會近似於今日所謂的「自信心」、「自我控制力」、「自我察覺能力」，以及「心理調適(mental accommodation)能力」等概念。依當代企業心理學的研究，自信心、自我控制力、自我察覺能力等，都是成功者的心理特質之一（林欽榮，2000，頁 377）。一個人有自信心（不是自大），往往比較沉穩、踏實，有計畫性的進行活動，終有所成，而贏得別人的尊重；一個人有自我控制力，往往是不需要他人支持或刺激便能自主行動，勇於任事；一個人有自我察覺能力，往往會自我洞察與反省，並敏於衡量情境、發現問題、解決危機；一個人有心理調適能力，往往能在思想或行動上作自我調整，藉以維持其自身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並美化自己內心的心理空間，保持其清淨靈明，使獲得人生的樂趣。有了這些工夫、能力，在謀職就業或創業上，自較能得心應手。

二、重揭身心修養的核心價值，牖迪學生涵養品格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曾於 1998 年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臺灣總體檢」實徵性調查。該研究報告指出，1996 年至 1998 年，國內連續發生重大刑案，使國人對社會風氣惡化、政治敗壞以及文化品質低落感同身受，絕大多數的國人都對當前社會現實、功利的現象感到憂心和不滿。調查

結果顯示，有 76% 的受訪者認為我們的社會需要心靈改革。至於心靈改革要從何著手？有 33% 的受訪者主張「從每個人自身修養做起」，其次有 27% 主張「從教育改革做起」，再次有 12% 主張「從恢復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做起」等（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8，頁 290-291）。這說明自身修養、教育改革、重建傳統倫理諸項，從人格陶冶與修身教育等根本性方法切入以實施心靈改革，化洽人心，較諸採用「掃黑肅貪」（6%）（同上，頁 291）這類末端問題出現後才懲以刑罰來得被看重。

社會風氣惡化、人的素質低落，確實值得檢討改善，而有識之士對於當代大學生的修養，負向的評價也不少。1985 年，歐陽教曾愷切地指出：「（今天）德育上最大的缺陷，就是……青年也像成人社會一樣，好大喜功，希望能手握大權，主宰一切，發號施令。……他們踏入社會後，一旦權力在握，常濫用或惡用權力，作威作福。」（歐陽教，1985，頁 384-385）本來青年期的大學生，在個性的發展上，會尋求獨立自主性，自我意識逐漸強烈，有時顯得狂傲而且野心勃勃，可說是自然現象。但是，像歐陽氏上面所評論的，大學生在校期間就希望手握大權，發號施令，於修養上總不相宜，況且養成這種不良習氣，出社會後，作威作福，更非吾人所願樂見。

2005 年，中部某大學三年級學生修習通識課「生態教育」，應教授要求寫下指定的一本關於環保與土石流書的讀後心得報告，茲摘引其中二段如下：

萬般皆下品，唯有分數高，而就算分數高也不一定能賺大錢，要賺錢還得把人格拋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碰過找我五百元假鈔卻死不承認的人嗎？我只能拿來學校福利社用掉，我絕不會內疚，反正吃虧的不是我就好。……為了自己傷害別人，這是生物本能，天經地義（陳玉峰，2005，頁 86-87）。

會有土石流又如何？我家不靠山，死不到我家人。……能讓我賺錢、賺名聲、賺權勢的就是好教育，這時代早已不需要聖人了。……我只要有名有利，就算沒人格又何妨（同上，頁 87）！

這二篇心得報告，充斥著為名、為錢、為勢，而把人格拋的話語；相反的，教育所要培養的正向品格特質，如誠真、仁義、慈悲、謙虛、尊重、友善、博愛、利他、關懷、遠見等，卻似乎蕩然無存。這反映出我們的教育確實出現了問題，大學生的品格修養、價值系統等，有亟待導正、修補、澄清之處。

就業固然須具備從事工作的專業知能，才能勝任愉快，但若失於身心修養，則將嚴重影響職業操守，可能因此難以久任（無論是主動辭職或是被動離職），甚至危害公司及其他人。鴻海老闆郭台銘曾表示：他容許年輕人犯錯，但絕不寬待來自個人操守的錯（張殿文，2007，頁 80）。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於不久前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邀請於「提升國家競爭力——大師講座」，以「新世紀人才應具備四價值七能力⁶」為題（引自鄭芬姬，2012，頁 248-251），發表演說。其中，四價值之第一項「正直與誠信」與上述魏源所重視的「仁」與「廉耻」可說是相通的。依張氏的觀點，二十世紀末期的全球泡沫經濟留下貪婪等後遺症；人如果沒有正直與誠信，就算有聰明才智和專業知能，永遠也只是個危險人物、定時炸彈。張氏舉例說，美國恩隆案中的會計師都是聰明、有能力的人，但他們查出公司有問題卻不講，就是沒有正直與誠信。其結果是幾萬人失業、幾百億美元的股東財富灰飛煙滅。

實務上，與修養相映現的工作態度和精神，經常是企業招聘新員工

⁶ 四價值是：第一，正直與誠信；第二，大我的舊價值須重振；第三，勤奮，這是臺灣經濟奇蹟最重要的因素；第四，有待重振的舊價值，皆是長期耕耘。七種能力是：一、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二、創新的能力；三、自動自發、積極進取的精神；四、專業訓練加以商業知識，五、溝通的能力，六、英文能力，七、國際觀。

極為重視的項目。例如張榮發領導的長榮集團，為了從諸多應徵者中篩選出真正懂得服務業真諦的員工，每次招考新伙伴時，都會進行一項所謂「適職測驗」，藉以瞭解應考者的價值觀、工作態度以及服務精神（靜崗、夏雨雪，2000，頁 39）。「誠於中，形於外」，身心修養有虧欠者，在這類測驗的反應上往往會露餒。前述魏源重視每個人的自我德性修養，以德馭勢、利、名，呼籲通過自反與尚儉工夫踐行仁與廉恥，實足作為當前大學生謀職就業前之自我惕勵，深加涵化，以奠定將來應徵工作時的良好品格特質，並可厚植未來工作上篤正之職業操守，大大裨益於生涯發展。

三、倡導律己原則與自我教育，引領學生型塑形象

近數年，日本著名建築師安藤忠雄，經常應邀到世界各一流大學講課。他發現，「愈是（課業與考試成績）優秀的學生，愈難以傾聽別人的意見，以致進入社會之後，很難真正發揮對社會的影響力。」（林靜宜，2009，頁 70）安藤氏此處評論的對象正是魏源批判的自是自大的人，兩人雖是出身不同國家，且相隔 100 多年，但所見到因疏於反省自己的不足而拂物非人者的缺憾卻是極為接近。

一般人總是要求別人的多，要求自己的少，乃至一有失誤，又往往推諉塞責。這在企業主眼中是非常不當的。前面提到的鴻海總裁郭台銘，他的公司在 2007 年全球《財富》（Fortune）五百大企業排名第 154。那年的「新幹班」演講中，郭氏特別對年輕幹部指出：

鴻海現在就像是一個巨人，年輕人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躺著也會比別人高！就是因為站在巨人肩膀上，更需要自立自強。……如果不能要求自己、端正自己、鞭策自己，那麼巨人往前走一步，就會把你從肩膀上震下來（張殿文，2007，頁 80-81）。

這段話，說出了成功的大企業家對剛加入團隊的年輕新手在律己與自我教育方面的要求與期待。與此類似，嚴長壽在《總裁獅子心》亦自述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中，經常「再教育自己」（嚴長壽，1999，頁 104）。長榮集團的工作成員，雖然多半是學歷並不頂尖的私立大學或專科學校畢業生，但公司非但未見走下坡，反而更加擴張發展，其關鍵是張榮發用的人才是「不斷自我成長、自我挑戰，而且能與別人合作的人。」（靜崗、夏雨雪，2000，頁 107）

律己與自我教育，概指向個體應自我要求高品格，而這往往是大企業家用人的主要考量。以郭台銘為例，他說：「鴻海用人哲學：第一看品格；第二是要有責任感；第三是要有意願工作。」（張殿文，2007，頁 132）該公司採購部門主管受訪指出：「品德一向是鴻海強調的第一用人標準，……其他的能力都可以後來培養，但品德是必須自我要求的。」（同上，頁 132-133）點出了品德、操守必須由當事人自我要求的實情。

採取高品德之標準來自我要求，樹立一個良好的「自我形象」（self-image），在提高就業力上是很重要的，特別是要在別人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並獲得自我推銷成功的時候。自我形象是一個人的風貌儀表和舉止態度的綜合，它是心靈、精神、品格的外露，是內在優良氣質、德性的體現，它實際反映出一個人的品德修養、學識內涵、處世態度等。而一個人的自我形象，是日積月累逐漸形成的，需要個體平常就要不斷反省自己，做到自律、自我教育，努力改善並塑造自己的形象。魏源呼籲人們從「自反」做起，隨時檢點自己的一思一行，惺惺修省，勇於攻本身的異端，使內禦日強，過而能改，以完成進德修業之旨。此倡導律己原則與自我教育的理念，足作當前大學生的借鏡，引領他們型塑良好的自我形象。

肆、結語

綜上可知，清代道咸年間大儒魏源，既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務實的思想家。他究心陽明學，主尊德性兼道問學，留心時務，志在用世，體現出清中後期國難危急之際儒者難有之大義精神。

魏源在其思想代表作之一的〈默觚〉中，型塑了理想人格，對理論上以「心」為德行修養之核心、價值取向上以「德」馭勢、利、名，內涵上以「仁」與「廉恥」相聯繫和方法上重「自反」與「尚儉」工夫等方面做了學理論述。同時，針對貪得無厭、罔顧廉恥、麻木不仁的鄙夫與鄉愿，則予以深刻揭露和批判。在魏氏看來，社稷之興亡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才，而人才的標準以「德才兼備」為是。

魏源的人格思想，對於今日大學生可有下列三項啟示作用：一是，強調「治心」的重要義涵，啟發學生料理己心。吾人成長、受教育、謀職就業歷程中，難免遭遇挫折與困境，設如心地工夫脆弱，往往無法面對挑戰和工作壓力，而敗退下來。反之，若能善於料理自心，那麼很多生活上、學習上與工作上的問題，都較易正面因應之。二是，重揭身心修養的核心價值，牖迪學生涵養品格。就業固然須具備從事工作的專業知能，才能勝任愉快，但若失於身心修養，則將嚴重影響職業操守與人際關係，可能因此難以久任。三是，倡導律己原則與自我教育，引領學生型塑形象。一般人總是要求別人的多，要求自己的少，乃至怨天尤人，推諉塞責。魏氏呼籲人們從「自反」起軔，勇於繩過，勤於修養，以型塑自我形象，固本清源。這些觀點，對於牖迪當前大學生涵養品格、培育軟實力，應有助益。

參考文獻

一、古籍部分（先按朝代先後，再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由少至多排列）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85。

明·王守仁著，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4。

清·魏源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

清·魏源著，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古微堂內外集》。長沙：岳麓書局，2004。

清·魏源編，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皇朝經世文編》。長沙：岳麓書局，2004。

清·魏源著，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海國圖志》。長沙：岳麓書局，2004。

清·魏源著，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書古微》。長沙：岳麓書局，2004。

清·魏源著，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聖武記》。長沙：岳麓書局，2004。

清·魏源著，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詩古微》。長沙：岳麓書局，2004。

清·魏源。《老子本義》。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二、近人論著部分（依作者姓名筆畫由少至多排序）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8）。**臺灣人的文化觀**。臺北市：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王家儉（1981）。**魏源年譜**。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王家儉（1984）。**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臺北市：大立出版社。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1983）。**清史列傳**。臺北市：中華書局。

田培林（1976）。**教育與文化（上）**。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 伍振鶯、林逢祺、黃坤錦、蘇永明（2005）。**教育哲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 李國祁（2005）。包世臣與魏源經世思想比較分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3**，137-167。
- 吳大猷（1986）。**教育問題**。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 林欽榮（2000）。**企業心理學**。臺北市：揚智文化出版社。
- 林鳳妝（2007）。清季自強運動興起的一項動力——論魏源的經世思想。**興大人文學報**，**38**，337-370。
- 林靜宜（2009）。**改變成功的定義：白袍 CEO 蔡長海的利他願景學**，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 陳玉峰（2005）。**敏督利注**。高雄市：淨心文教基金會。
- 張春興（1991）。**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市：東華書局。
- 張殿文（2007）。**解碼郭台銘語錄：超越自我的預言**。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 張麗珠（2011）。魏源突破儒學傳統經典視野的維新思想。**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52**，23-57。
- 閔爾昌纂錄（1985）。**碑傳集補**。臺北市：明文書局。
- 賀廣如（1999）。**魏默深思想研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彭大成、韓秀珍（2006）。**魏源與西學東漸——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艱難歷程**。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曾志朗（2013）。**正直**。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 黃麗鏞（1985）。**魏源年譜**。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楊伯峻（1990）。**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
- 蔡仁厚（1982）。**孔門弟子志行考述**。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鄭芬姬（2012）。**人際關係與溝通**。臺北市：新陸書局。

靜崗、夏雨雪（2000）。長榮之道：張榮發的致富哲學。基隆市：亞細亞出版社。

歐陽教（1985）。德育原理。臺北市：文景出版社。

錢穆（1986）。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市：東大圖書出版公司。

錢穆（1984）。中國學術通義。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羅國杰（1995）。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修養卷。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

嚴長壽（1999）。總裁獅子心。臺北市：平安文化出版公司。